

从一则新史料看陈垣的文化观

□ 刘 贤

2009年出版的二十三卷本《陈垣全集》中,披露了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一篇未刊作品的提纲。该提纲作于1941年12月8日,题为《伟大之中华民族》。在他所有的文章著作中,这一标题的感情色彩之浓重无出其右。将其与陈垣的其他著述相参证,可全面了解他的文化观。

一

陈垣的文化观可分为两部分,首先体现在姓氏论与民族观上。陈垣认为,“无一姓无外来民族加入”。此为《伟大之中华民族》“最要证明”者。而这一观点在陈垣早年即已发端,他曾于1930年代提及这一观点。辛亥革命前后陈垣的满汉观点即带有这一倾向。辛亥革命时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宣传深入人心。曾为同盟会会员的陈垣,一方面具有鲜明的反满反清立场,但是另一方面却不主张排满,而是力主满汉调和,并反对区分满汉畛域(《陈垣早年文集》)。1936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陈垣谈到他正在撰写《汉以来新氏族略》。他认为“汉”是从陆路与中国交往的外国中国的称呼,汉族在历史上是融合同化了许多民族后形成的,仍在融合同化之中,他指出:“我觉得现在的人常常说‘汉族’,这是绝大的错误。严格地说,只能说中华民族,因为我国没有纯粹的汉族,都是混合民族,同时这种分别的称呼,很容易使其他民族起疑,而发生无谓的争执。其实我们单从姓氏一方面考察,多半都是各族混合的。”“这部《汉以来新氏族略》是考察民族史的,搜集汉朝以来信史,归纳逐条解释,而供国人参考”(音频:《学人访问记——历史学家陈垣》,《世界日报》1936年1月5日)《汉以来新氏族略》写成后,“因牵涉面广”,并未刊发,后来,连底稿也不完整了(刘乃和:《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

但是,作于1941年的《伟大之中华民族》提纲却保留了十分类似的观点和内容。在笔者看来,《伟大之中华民族》之撰写计划既是《汉以来新氏族略》姓氏问题的扩展,也是作者对中国历史大势的理解和把握。从标题一望即知,此著饱含作者对中华民族的无比自豪。提纲以“广土众民,君子乐之”开篇,统领全篇42段文字。每段非常简洁,由一两句话构成,应当是全文的各个要点。其中,姓氏问题居于首位。在42段要点中,论述姓氏者亦接近一半。比如开篇后第二句即为“无一姓无外来民族加入”,陈垣认为,无论“东来之姓,西来之姓,南来之姓,北来之姓。中部之姓,如荆蛮、豫蛮”,他们“同语言、文字、风俗、习惯”。

提纲中,“外族之内徙”共用五段文字分述,应该是要详细展开的部分。“前篇言历朝外族之同化”。将以朝代为主,分述先秦、汉魏六朝、唐五代、两宋、辽金元和明清历代归化的外族。“后篇言各姓同化(参人)之外族”。将以姓氏为主,述各姓参合之外族。“各姓新族之参合,包括上平各姓,下平各姓,上声各姓,去声各姓,入声各姓。”提纲中还包含“东晋教鄂罗斯族之汉姓”、“各地外族之归化”“五胡之君奸文学”等章节。

这一观点亦延续至陈垣1945年撰成并发表的《通鉴胡注表微》“夷夏篇”中。陈垣提到鲜卑与汉族共处通婚,到隋唐之后,已分辨不出彼此。丹乌在元朝时期,女真在元朝时,都称“汉人”,与汉人已为一家。胡三省常常感叹“中国自此胥为夷”,陈垣则自信地反驳:“岂知夷至此胥为中国乎?”他引《春秋》公羊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认为夷夏观念在当时,“非尊己卑人也”,“内外

亲疏之情”乃“出于自然,不独夏对夷有之,夷对夏亦宜然。”在他看来,夷夏观念,就是“民族意识”。这就是陈垣“无一姓无外来民族加入”的姓氏论和民族观。

二

陈垣的文化观不只限于探讨中国境内及与周边民族关系,还包括外来宗教观。众所周知,陈垣以宗教史研究著称于世,其开创的外来宗教研究被称为古教之“绝学”,包括研究元代来华基督教的《元也里可温考》(1917)、研究犹太教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和《摩尼教入中国考》(1922)与《火袄教入中国考》(1922)。“古教四考”与陈垣的代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1923)所探讨的对象都是外来宗教文化。在陈垣所擅长的外来古教研究中,外来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乃是其深义之所在,这一点可见于陈垣在探讨这些外来宗教时,在三个方面的研究侧重:

第一,侧重宗教传入的接受史。“古教四考”的几本著作都是以这类内容为主体,如《火袄教入中国考》,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火袄教传入及被中国接受的历史,包括第一至第八章,含“火袄之起源”“火袄之始通中国并其名称”“北朝火袄之奉祠”“唐初袄字之创见”“字书袄字之增入”“唐时典籍称袄之略例”和“春秋时雎水有袄神之谬说”;第二部分与景教、摩尼教的比较(第九至十一章)和第三部分结果及影响(第十二章)只占全书章节的三分之一。除了篇章安排外,“接受史”也可见于对细小问题的把握。例如从第二至第六章,陈垣以“火袄”教之名称的创见、改造和被官方接受,来看其宗教在中国被民间和官方认同接受的过程:火袄教拜日月水火,所以“袄”之称谓,从“示”从“天”,表示天上的神,但为了区别于中国的天神,造了“袄”字,该教则被称为“火袄教”。

第二,侧重外来宗教的信徒被中华文化所同化的现象。陈垣从“儒学”“佛老”“中国诗文”等方面,举出大量事例对此加以证明。如高唐王阔里吉思,本为基督教徒,但是他“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经意”。再如摩尼教世家高昌契氏,“一门两代,凡九进士,时论荣之”,而“科名之盛之如契氏,不读孔氏之书而能然耶?”还有外国宗教和儒学,再入佛,极精于汉学的“双料华化”者,如小云石海涯。其祖父是“畏兀人”,但他本人既通中国诗文,又谈禅学道。通过他们被中华文化同化的事实,陈垣感慨道:“特患其不通中国之文,不读中国之书耳;苟习其文,读其书,鲜有不被其陶化者”,表达了对中华文化感召力的坚定信心(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第三,侧重外来宗教的遗留与影响。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陈垣全文引用张相文的《大梁访碑记》,记录宣统二年的犹太人状况,张相文曰,犹太教的遗民“一切起居状态,祀先敬祖,与汉民无异。然谛审之,则高鼻深目,与高加索种相仿佛。”《火袄教入中国考》中,陈垣提到该教在唐末虽已被禁,但仍有宋人信奉,并使用了袄教在元曲中遗留的资料,“不独未曾消灭,且更形诸歌咏,播之管弦,想其意义已与中国旧俗之火神相混,非复如西来之火袄教矣。”

以上外来宗教的接受史、被同化和遗留影响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既是说明外来宗教在中国,无不被中华文化所接受、同化和融合,而中国文化除了本身特有的儒老、中国文学等,也融合容纳了包括四种外来古教在内的各种宗教文化。正如陈垣



所总结的:“其旧俗譬之江河,中国文明则海也,海无所不容,故无所不化。”(《元西域人华化考》)以上是陈垣的“外来之宗教可成为中华宗教”的外来宗教观。

三

可以说,由姓氏、而民族、再至宗教的中华文化观,是陈垣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不同流俗,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1900年代,其“反满”但不“排满”的满汉观,超越了时人在革命之后因时势之需才转换的立场。至1930年代,其民族立场,既与当时将“未结合之种族而欲混而同之”(如将徐福东渡之日本后裔混同于汉族)的调和观点截然不同,也与将“已结合之种族而欲析而别之”(如将匈奴后裔、契丹后裔从汉族中分离)的种族主义观点迥然有异。

在1920至1930年代,中国文化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后,在文化的前途问题上出现了各种思潮与主义的碰撞和交织,另走两个极端:或者持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华文化优越,而拒绝接受外来影响;或者持全盘西化观点,要将西方文化全盘带入。而陈垣由外来宗教史推出的文化观与二者皆不相同,他既反对前者的封闭保守,又反对后者的极端崇洋。他对中华文化具有坚定的信心,但同时也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他的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文化观。

如果说,1900年代至1930年代陈垣更强调的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那么到1940年代,结合抗日战争的大背景和他的其他成果,可知陈垣规划《伟大之中华民族》一书,其实更着重于强调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命力:“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入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通鉴胡注表微》)而保持生命力之关键,则是陈垣在“宗教三书”,即《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和《清初僧诤记》(1941年)中论证的“贵能读书而不仕”之观点。可见,《伟大之中华民族》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与“宗教三书”一样,都包含了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对自身处境和国家民族处境的深刻思考,是对外族人入侵所产生的文化保存和发展问题的时代回应。

总之,陈垣始终相信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研究民族学,不知中华文化之大也”,“善能吸收外来民族,故能继续发展而不衰老”(《伟大之中华民族》),也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顽强生命力的坚定信心。“嗚呼,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任者屢矣,然卒能用夏夷,远而北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便是陈垣的文化观的要义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图书评介

《蜕变与重生:民国华北牙商的历史演进》评介

□ 刘兰兮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彦台博士撰著的《蜕变与重生:民国华北牙商的历史演进》,以民国时期华北牙商为研究对象,对华北牙商的历史演变、群体结构、资本构成、社会流动、经营交易、管理制度以及与市场、政府互动共生的诸多方面内容作了深入探讨,揭示出华北牙商和牙商资本在民国社会转型期蜕变与重生的历史命运,并剖析了市场贸易中传统与近代的关系,总结了近代商业群体变迁的基本趋势,考察了社会变迁中的变与不变,断裂与传承。据诸全书,有以下创新之处。

第一,对牙商群体和牙商资本的演变趋势提出了新的认知。该书认为,牙商群体原是传统社会中的一个下层群体,近代以降,由于经济转型迟滞性与市场化进程复杂性,牙商群体在市场经济中所占重要地位不仅没有式微反而愈加凸显。牙商群体的人员结构、经营方式、社会关系、承担的税负、经营纠纷、商业地位、资本的扩张和转移等发生一系列嬗变,并逐渐演进为适应近代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需要,适应国内现代化进程需求的群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部分牙商,在积累了可观资本后突破了中介的经营范围,将资本向流通领域、生产领域和金融信贷领域扩张和转移。这种动态的演进过程既体现了资本的周转和发展,又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的进步。

第二,从新的视角考察了牙商与市场、区域经济间的关系。在传统的重农抑商理念下,常常会有人误认为牙商是“阻碍商品经济发展”“不必要存在的中间环节”“无罪也该杀”的商业投机群体。这本书的研究证实了民国牙商群体在国内外贸易中起着桥梁、纽带的作用,他们对中国近代市场贸易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宋代的民间长者及其社会功能

□ 姜立刚

长者是中国古代对年长、有德、位尊者的敬称,在不同时代,其内涵有一定变化。“长者”一词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只有具备年长、位尊、厚德自尊等条件的人才可被称为长者。秦汉间,由于自身具备的道德资源,长者又进一步被赋予了政治功能,许多长者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来,陈平、酈生、萧何、曹参、周勃、张敖如、石奋等人即是其中代表,长者群体具备了浓厚的官方色彩。唐宋时期地方社会主导阶层出现重大变化。唐代,长者作为准地方精英群体成为管理地方事务的重要力量,这些地方精英仍然或隶属于官僚体系内部,或有深刻的官方背景。但是,相对于前代,这些地方精英的官方背景逐渐弱化。在宋代,地方精英大量出现,民间长者成为地方精英中的重要代表,并在地方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宋代民间长者的构成与条件

宋代的地方,大体分为庙堂长者和民间长者两类。庙堂长者即在朝廷做官的道德君子,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这些长者不是普通地方官员,而是在中央任职,且大都位高权重,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官员。他们之所以能在统治阶级高层体系中被称为长者,是因为他们往往具备宽厚、节俭、淡泊名利、待人温和等较高的道德品行。民间长者即地方社会中的权威人物,他们是地方精英中的佼佼者,年龄大、学识广、品行好、声望高,为地方社会作出较大贡献,在地方社会管理和整合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代民间长者的构成比较复杂。一是读书人。如胡几、詹至、沈端辅等人或“世业儒”,或“博学有声”,同时又具备品行高、待人宽厚的特点。二是有经济实力的人。如徐量、许琳、李发等人较为富有,且乐善好施数十年,于是乡誉日隆而被称为长者。三是“长厚君子”。如李岩非官非宦,因其潜心事农,“躬率礼义”,有儒雅之风,受到当地人的尊崇,被尊为“长厚君子”而成为长者。

可见,在宋朝要成为民间长者,除了年纪较长外,还必须要达到品行好、修养高、有益地方等条件。同时,成为长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即在具备前述条件基础上,要经长期的历练。长者称谓正是声望日隆的结果。同时,地方精英和民间长者有很多区别,地方精英不可能都成为长者,地方精英身份只是成为长者的前提。德高望重、地方影响力大才是具备长者资格至关重要的条件。

二、宋代民间长者的社会功能

在古代中国,朝廷并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官方力量包揽地方社会事务,因而需要借助民间精英力量来实现对地方社会的管理与调控。作为地方精英中的杰出代表,宋代民间长者的影响力极大,在参与地方事务、进行社会救济、教化地方社会等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

对地方事务的参与。民间长者作为地

方权威,必须为他人及地方承担起责任,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长者在地方事务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在处理地方纠纷、稳定社会秩序、投身公益事业等方面。

宋人刘允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刘允恭“赋性方直,气象深厚”,很有社会影响力,因而被当地士大夫推为长者。他利用其地方权威身份,对做了不义之事的后生辈,“必诘之,厉然见于颜色”,维护了社会风气。他还常调解乡里纠纷,对争论者“为之陈道理曲直,法令不可不”,使争论者“往往羞缩退让以去”,把一些地方诉讼争端消弭在萌芽状态中,甚至起到官方所不能起到的稳定社会的作用。刘允恭积极为地方排忧解难,投身地方公益事业。当地的河流常因涨水而为患乡间,于是他“糜钱千余万”,疏通河道,为地方解除了水患。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



对乡邻的社会救济。在传统社会中,各种自然灾害频发,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民间长者会对遇到灾荒的困难乡邻进行救济。例如,绍兴四年婺源大饥,当地长者许琳“尽散家粟,活万余人”。有的甚至赈济灾民数万人,且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如汉州长者李发赈济灾民,“自绍兴之丙辰至此,三十余年,岁以为常。”民间长者积极参与地方赈济工作,是对政府赈济的极大补充,且民间长者生活于地方,对地方灾情掌握更清楚,救济更快,更有针对性,因而更为有效。此外,平时长者也会对乡里生活贫困者、身体病弱者进行救助。

对地方社会的教化。在地方上,民间长者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对当地社会的教化卓有成效。一方面,民间长者通过资助兴办学校、修缮寺庙等方式来实施教化。例如,无锡县长者在当地捐资修筑了寺院,还招选名僧为民众开堂讲经。另一方面,长者们通过自身魅力,以其言传身教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教化。如淮南李岩“每岁则治其沟洫,时其耕耨莫不法”,当地农民受其表率作用影响,不敢怠慢农事;其“躬率礼义”,连乡之士子也“悉慕慕之”。还有一些民间长者的作为引起了官方的重视,受到统治者的肯定及表彰,更加扩大了其自身的影响力。如婺源长者许琳因赈灾行为而被朝廷旌表,汉州长者李发数十年的赈灾行为受到孝宗皇帝嘉奖。统治者的肯定与表彰,大大强化了长者言行的道德感召力,从而增强了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有宋一代,民间长者声望日隆,在乡里地位颇高。史籍称,“行路之人,遇其乡闾之长人与有德者,则必凛然有肃恭之容”,乡人对长者极为尊重。由于民间长者具有的高尚道德和突出的社会功能,人们有时会将光环附于某些长者身上,甚至将其神化。例如,秀州长者张道望参与求雨成功,竟被当地人认为有求雨功能,称为“感应司雨”;金坛长者刘宰举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赈济活动,当地人为其建立生祠,成为了人们祈祷消弭蝗灾的神庙。别除民间中的迷信色彩,这些事件体现了人们对民间长者品德与行为的肯定,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的重要功能。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史海钩沉

也谈刘孝绰与《文选》的编撰

□ 邹建雄

关于《文选》的编撰问题,向来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之一。首先,从最简单最直观的相关记载来看这一问题,除萧统外,历史上能搜罗到的关于《文选》的编撰者的说法,直接的只有两处:其一,《文镜秘府论》载:“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文选》”;其二,宋代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录《文选》并注曰,“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何逊参与《文选》的编撰已被学界论断为不是事实,我们暂且搁置不论。但是,是刘孝绰而非其他任何人在两条仅有的记载《文选》编撰者的史料中得以同时出现,在没有其他直接证据的前提下,我们大概也不得不承认,即使刘孝绰不是《文选》唯一的编者,也至少是最主要的编撰者之一。另,据屈守元先生《跋日本古抄本文选》注三卷本《文选》载,日本所藏的古抄本《文选》在其序的旁边有“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的字样,那么《文选序》也极有可能为刘孝绰代萧统而作。的确,《文选序》与刘孝绰的《昭明太子集序》有着太多的理论相似之处。

其次,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量这个问题。萧统东宫之中,才子学士众多,有著名的“东宫十学士”,《南史·王或传》附《王锡传》载:“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王)锡与秘书郎张缵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缵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除此之外,尚有殷胥、明山宾、陆襄、刘勰、杜之伟、到流、刘苞、庾仲容、何思澄、刘孝、顾协与钟屿等先后奉职东宫,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名重一时的精英人物。既然聚集了天下精英的文人学士,那么,萧统选谁来编撰《文选》呢?根据南朝注重门第观念,这些名流可以分为三类:其一一是其家族自东晋以来一直门第较高者,如王筠、王规、谢举、张缵、张缵、张率、陆倕、陆襄、顾协等;其二为“新出门户”者,如

刘孝绰、刘苞兄弟,到洽、到流兄弟等;其三是门户一直不高者,如刘勰。根据门户至上的观念,第三类文士是不可能被萧统选中的。

我们再看第一类人物,其代表者是王筠。据史传,王筠颇早慧,七岁即能文,得沈约盛誉,史载“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沈约评其“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其文才“与刘孝绰见重当世”。萧统亦以王筠与刘孝绰并提:“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可知。”可见,王筠与刘孝绰才学实不相轩轾。况且,王筠出身于一流高门琅琊王氏,其六世祖王导为东晋名相,曾祖王昙首为刘宋文帝心腹,祖父王僧虔为齐司空,可谓家世显赫,其他人无出其右。照理来讲,王筠是《文选》极为理想的编撰者。但是,正是这种显赫的家世,使萧统在选王筠主持修撰《文选》的问题上有所顾虑。

而刘孝绰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彭城刘氏刘孝绰一支与兰陵萧氏萧衍一支在家世背景上颇为类似。首先,兰陵萧氏的远祖同彭城刘氏刘孝绰一支的远祖皆为赫赫有名之辈,萧衍远祖可以追溯至汉代名相萧何及萧望之,而彭城刘孝绰一支源自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之后裔汉著名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其二,历经久远的年代,兰陵萧氏和彭城刘孝绰一支到东晋皆被摒弃在世家大族之外,成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北来次等士族”。萧衍一支的萧先萧整官仅淮阴令,而刘孝绰高祖刘怀义亦只是始兴郡守。其三,兰陵萧氏与彭城刘氏俱以武功起家。兰陵萧氏“皇舅房”一支的萧思话,以外戚身份东征西讨,官至中书令,而“齐梁房”的萧道成之父萧承之正是追随萧思话四处征战而地位得以逐渐上升,为萧道成以后统领刘宋朝政大权并进而篡夺皇位夯实基础。彭城刘

(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